

彭珮云：中国特色的人口控制之路(上)

两次生育高峰

马国川：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彭珮云：1981年3月6日，五届人大第十七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其实，早在1962年国务院就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在城乡推行计划生育。不过，计划生育办公室是临时性机构，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负责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马国川：看来，计划生育工作并不是从八十年代才开始的。

彭珮云：更早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卫生条件逐步改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16‰猛增至1953年的23‰，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从关心育龄妇女健康出发，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严格控制避孕药具的进口与销售。1953年全国总人口接近6亿，比1949年净增6000万。在短短三四年时间里，人口再生产类型迅速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过快的人口增长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次指出，人口要有计划增长。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

马国川：也就是说，从1953年就开始进行计划生育的试点了？

彭珮云：对。当时以马寅初为代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是对公众生育权的尊重，也是契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状态，意义深远。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珮云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长达十年(1988-1998)，经历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最严厉的一段时期，是一位重要的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六年前她接受《财经》记者马国川的专访，对新中国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财经》日前重刊此文，本版摘录主要部分内容，以便读者更清晰地了解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生、演变过程。

表的社会有识之士也积极主张实行计划生育。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冲击，人口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从1962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我国进入了持续8年之久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达到7亿。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在毛泽东提议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城市逐步开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这个阶段的计划生育工作阻力很大、步履维艰。并且，由于广大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全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马国川：资料显示，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大约20年的时间，人口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4亿增长到8亿，净增了近2.6亿。

彭珮云：人口过了8亿，各种压力日益增大。所以，1972年国务院发文件正式要求：“实行计划生育，

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从1973年开始，人口发展列为国民经济计划。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正式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第二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开展，特别是在农村收到了明显成效。人口出生率迅速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25‰。但是仍然高于正常的人口更替，人口形势严峻。所以，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修订人口计划

马国川：国家计生委的第一任主任是陈慕华，后来是钱信忠、王伟，您是第四任。在您刚刚接任主任时，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现状如何？

彭珮云：我刚到计生委的时候是1988年，这时候正是处在一个建国以来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88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14.2‰，就是全国的总人口这时候一年要净增1540多万人。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社会上包括计划生育系统内部对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高峰来了，就要坚决执行无论城乡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有些人主张只要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还是允许生两个孩子好。因为思想认识不统一，所以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既存在简单化、强迫命令的现象，也有些地方工作抓得不紧，甚至放任自流。我

到黑龙江、辽宁调查，他们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再加上工作力度大，所以工作做得比较好。调查的结论是，如果大家能够统一认识，稳定政策，抓紧工作还是可以达到目标的。上任的第三个月，1988年3月我代表国家计生委党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了当时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中央重申了现行生育政策，这就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生子女，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育第二胎；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方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马国川：国外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说成是“一孩政策”，看来这是一种误解。从中央政策看，我国的生育政策并不是一刀切，全国实行统一的政策。

彭珮云：不是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农村只生一个孩子的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四川的部分地方，约有17个省、区、市是允许第一个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云南、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可生两个孩子。西藏没有限制。实行这个政策是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生产力还比较低，家庭还是生产单位，一个农户只有一个女孩，在生产和生活上确有实际困难。在以后的十年中，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始终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吴东峰

第三章 战功(连载 18)

张云逸大将：“险为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

辛亥广州之役，张云逸将军踊跃报名参加“先锋队”（即敢死队），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4月27日，“先锋队”随黄兴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激战半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却。其时，清军围逼，张云逸等人被困于一民宅中。翌晨，将军持竹篮，佯买菜，上街探视，以觅突围道路。回返之际，见所居民宅清军林立，所有同志皆被枪杀，血染街头，而独将军幸免。故张云逸将军自言：“险为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

王树声大将：参加黄麻起义，转战木兰山
1927年11月，王树声将军率家乡赤卫队参加黄麻起义。兵败后，将军率队退至木兰山，仅余72人，42条长枪，9支驳壳枪，2支手枪；继余18人；后仅余9人。两年后，王树声将军率游击队发展至300余人。

粟裕大将：“韦岗新土井，处女秦凯还”
1938年6月17日，粟裕将军率江南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江南敌后，韦岗伏击，初战告捷。是役，我军击毙日军军官2名，士兵13名，缴获长短枪10余支，击毁汽车4辆。我军只付出了阵亡1人，负伤数人的代价。战后，粟裕作五言诗一首：“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韦岗斩土井，处女秦凯还。”陈毅闻之亦赋诗赞曰：“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粟裕将军威名由之鹊起。

陈赓大将：陈谢大军经略中原
1947年7月，党中央决定，在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前太岳纵队）的基础上组建一支比较大的部队，主要领导人指定为陈赓、谢富治，下辖第四纵队、第九纵队、第38军（原西北军起义部队）共8万余人。从此，陈谢合作指挥作战进入了辉煌时期。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主席令刘邓野战军主力跃进大别山；陈谢兵团挺进豫陕鄂；华东野战军主力挺



进陇海路，进至豫皖苏地区。组建不久的陈谢兵团即奉命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与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并称为中央经略中原的三支主力部队之一。

陈赓大将：抗法援越屡获大捷

1950年9月，陈赓将军指挥越军攻克东溪法军，首战获胜，继于谷社山区追敌，遇敌顽抗，进展困难。其时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命令停止进攻，陈赓将军闻之大怒，谓武元甲曰：“如果这样的仗还不打下去，我就卷铺盖走了！”胡志明闻之，令武元甲按陈赓方案继续打下去，遂大捷。武元甲亦服之。

张云逸：从容指挥半塔保卫战

1940年3月，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纠集八个团兵力，万余之众，乘虚进攻新四军五支队后方半塔地区。张云逸将军临危不惧，从容指挥，以教导队500余人固守半塔，以十团、十五团各一部及特务营，从南北两翼钳击围攻半塔之敌，苦战七昼夜，半塔阵地巍然屹立。陈毅元帅高度评价半塔战役，曰：“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肖劲光大将：力排众议坚守南满

1946年秋，蒋介石飞抵沈阳，对东北制定“南攻北守”战略。敌集中八个主力师十万之众，向南满我军大举进攻，连克安东、通化、辑安等城，南满我军三、四两纵队且战且退。其时多数人主张退守北满，肖劲光将军力排众议，与陈云同志拍板坚守南满。陈云告肖劲光将军：“军事问题由你考虑决定。”而后将军从容指挥三纵、四纵一保临江，歼敌4000余人，初战告捷；二保临江，歼敌近两千，险中取胜；三保临江，歼敌万余人，以勇胜敌；四保临江，歼敌万余人，再获大捷。至此南满局势定也。

粟裕大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

1947年7月13日至8月27日，粟裕将军指挥发起苏中战役，首战宣（堡）泰（兴）、再战如（皋）南、三战海安、四战李堡、五战丁（堰）林（梓）、六战邵伯、七战如（皋）黄（桥）路，连连告捷，歼敌六个旅又五个交警大队共5万人。史称“七战七捷”。战后，当地军民欢欣鼓舞，以歌颂之曰：“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粟裕将军闻之大惊，急阻其传播。

21.蒋家巷居委会的前身

许多难民，一日三餐，吃饭用粮的数字很大。坐吃山空，玉皇山的存粮很快便颗粒无存，眼看要断炊了。李理山不畏困难冒险下山，通过日寇层层封锁，到杭州市去找当时的慈善团体“国际红十字会”请求支援。该会派人了解山上处境困难，同意供给粮食。李理山又组织人力下山运粮，一路上要通过日寇的岗哨关卡，困难重重。有时被敌人查出，日寇强说是这是给山中抗日游击队偷运粮食，人被折磨，粮食也被抢去。于是李理山又要设法请“红十字会”出面打交道、开证明，还要巧作掩护，才能把救济粮送上山。有时粮食上了山，而他本人却是空腹回到观中。虽然如此艰难、危险，而他依然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山上海火既停，这近两千难民的生活，经济支出浩大，渐渐难以继。李理山道长派了他的徒弟吕宗安前往上海，利用“租界”的偏安，在陕西路蒋家巷创建了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筹措救济杭州难民的食宿。这就是我们蒋家巷居委会的前身。

算来那个时候我家刚刚搬到蒋家巷不久。大概我妈妈也去过那个地方烧香捐钱的了。我们家是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逃难到蒋家巷的。李理山于1939年在蒋家巷建立玉皇山福星观分院。史料中记载上海福星观得到的宗教收入送回杭州，供给玉皇山上的难民生活开支。这样总共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杭州的战事逐渐平息下来，难民也纷纷下山谋生，人数渐次减少，玉皇山的难民收容所才告结束。

我问起家里年长的人，对小庙里的印象都很深，有一位老同学宏根说，以前最早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咸菜作，就是做咸菜的作坊，后来才成为居委会。

据说蒋家巷在1949年之前是个贫民窟、流氓窟，而在1949年之后，虽然关掉弄堂内的妓院、赌窟、鸦片馆，但贫穷和暴力仍在这座四通八达的弄堂中蔓延。蒋家巷有所谓“四大天王”的时代，我还没有出生，据老人们说，他们都是沪西的流氓大头子。其中一个叫金宝的天王，曾单身一人在腰上插一把匕首，把静安

寺的百乐门舞厅冲了个稀巴烂，十几个保安都近不了他的身。而在附近大自鸣钟的一场群架中，金宝的腿上被戳了五只洞，被人抬着回来。老人们说，尽管四大天王在外面名声很响，但从来不在蒋家巷内斗殴。我妈常说：“以前的蒋家巷，样样有。”大概我出生之后的上世纪50年代，蒋家巷开始大整肃，四大天王中有三人被政府抓去枪毙了，还有一人，就是金宝，因为

瘸着腿，被判了20年。在我懂事的时候，蒋家巷只剩下供应酱米油盐、杂货、老酒的几家店铺了。在这所有店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爿老酒店和一爿酱菜店。

这爿老酒店坐落在弄堂的中段，左首是一曲尺形的柜台，里面排着十几只老酒甕，均用青瓷制成，甕上用白纸写着：“土烧”“黄酒”“五加皮”“绿豆烧”“状元红”“大曲”等等酒名。每个甕上都有一个厚布篷起的圆盖头。老板姓吴，圆圆的脸，大大的嘴巴，逢人便笑。老酒店的右首则排开三四只方枱子，供酒客在里面小酌。

我父亲嗜酒如命，闲来无事便到酒店吃老酒，与老吴便成了好朋友。三年困难时期，我只有六七岁，记得

那时父亲常领着我到老酒店去坐坐。那时已经没有酒，连吃饭的粮食都没有，哪里还来酒。但老吴不知从哪里总会弄到些土烧，不敢公开外卖，便把酒灌进我父亲随身带的小茶壶中，偷偷地卖给我父亲喝。我父亲便手摸着茶壶朝嘴里灌，外人只道是我父亲在喝茶。1962年，我父亲58岁撒手西去。我的脑海至今还留着父亲坐在老酒店的柜台前，笑眯眯地一边与老吴闲聊，一边摸着茶壶喝酒的模样。

对酱菜店的印象则是在我小学毕业刚入初中的1967年。这爿酱菜店老板娘是天津人，女儿也正与我同学，却不在一个班级中。气人长得皮肤雪白，眼睛细长妩媚，但由于我不是在一个班中，当时又不时兴男女学生自由交往，于是每每经过酱菜店，便要抬眼往里瞟两眼，希冀看看那个皮肤雪白的女孩。有时去买酱菜，明知道她家的酱菜要比隔壁国营商店中的贵一点，也还是踏进门去，有时就为了去看她一下，但当时却始终没有想到如何去搭讪。

消失的蒋家巷

吴琦幸

